

## 家务分工与幸福感

杜凤莲 宿景春 杨鑫尚\*

---

**内容提要** 家庭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为4~5小时,约3/4的家务由女性承担,但关于家务分工会如何影响幸福感的研究却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CTUS),使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和条件混合估计(CMP)方法研究家务分工对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妻子家务时间占比对丈夫幸福感水平没有影响,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幸福感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具有倒U型关系。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公平感知是影响妻子幸福感的重要渠道,如果丈夫家务时间高于社区平均水平会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提高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可以缓解妻子时间贫困,进而提高其幸福感水平。本文验证了相对资源理论,受教育程度高的一方因有资源优势而降低家务劳动时间。

**关键词** 家务分工 幸福感 性别平等

---

### 一 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的家庭关系、严格的家教、良好的家风对整个社会风气、社会风尚和社会和谐安定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

---

\* 杜凤莲,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大学中国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电子邮箱:dufenglian@126.com;宿景春,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15754834205@163.com;杨鑫尚,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yangxinshang1994@126.com。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苹果为什么落不远?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经济融合的代际传递”(项目编号:71373111)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项目的资助。

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家庭社会分工是实现社会功能的重要形式，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微观层面的时间配置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进行时间配置过程中产生效用，比如把时间投入到市场工作中会带来收入，投入到家庭劳动中会提升家庭生活质量。

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经济自主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市场劳动。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0.45%，约为男性的80.31%。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平等的力量：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认为女性劳动参与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1%，同时男性也逐渐参与家庭生产（Aguiar & Hurst, 2007），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存在（Giovannis, 2015），在家庭内部女性无酬劳动日平均时长大概是男性的2.95倍（徐安琪、刘汶蓉, 2003；杜凤莲等, 2018）。因此目前中国双职工家庭中并不是“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在“男主外”已经转变成“男女共同主外”的情况下，“女主内”这一传统思维定式并未发生变化，家务劳动仍被贴上女性标签。这样的分工模式不仅会挤占女性的闲暇时间，而且过多的家务负担还可能使女性加速人力资本折旧，以至于在市场上丧失竞争能力，影响其职业发展。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继续加强“男女平等”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贯彻和实施。因此，研究家务劳动时间配置对幸福感的影响，对于理解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机制和提高家庭成员幸福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hinese Time Use Survey, 简称CTUS）数据，并通过样本信息识别出夫妻关系，从家庭层面研究夫妻双方家务参与行为对夫妻双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已有家务分工与幸福感的研究中，研究者因为数据可获得性原因很少关注夫妻层面，本文通过研究夫妻家务行为对其自身及配偶幸福感的影响，识别家庭内部个体自身行为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感受如何影响家庭整体幸福感水平，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家庭内部分工对幸福感的影响。其次，本文分别从相对资源理论、实际公平感知、时间贫困以及夫妻共处时间这四个角度验证了家庭内部分工学说和公平理论这两个影响机制。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影响机制检验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

## 二 文献综述

Giovanis (2015) 提出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家务作为满足居民个人和家庭内部成员的日常生活需求所必须进行的一项服务性劳动,其时间消耗和分配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以及夫妻对整体生活和婚姻关系的满意度 (Frisco & Williams, 2003)。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家务劳动消耗精力,长期过量从事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会带来劳损性疾病和抑郁症从而影响身心健康 (Barnett & Shen, 1997)。Carlson & Hans (2020) 研究表明,传统的夫妻关系把女性化的任务分配给妻子,男性化的任务分配给丈夫,这样会给妻子带来大量耗时且频繁的重复工作,从而导致妻子产生巨大的压力。第二,在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劳动力配置于工作、家务劳动和闲暇的时间是此消彼长的,个体花在家庭上的时间越多,就意味着没有充足的时间参与有酬劳动和闲暇等其他活动 (Bryson et al., 1978)。尤其是妻子在面临家庭照料责任和就业冲突时,很可能以牺牲个人时间为代价同时承担两份责任,造成女性的“时间贫困”,致使女性的生活质量和福利受损 (Floro, 1995)。齐良书 (2005) 研究发现自身家务劳动时间对妇女的工作效率和工资收入有负面影响,而对丈夫的收入却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承担适量家务劳动将会提高妻子外出就业的概率 (Cunningham, 2008),根据效用理论可知,高收入人群通常拥有更多选择,从而能更好地满足个人的偏好和需求。

关于家务时间配置对个体幸福感水平以及家庭整体效率的影响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在家庭内部分工理论中,Becker (1991) 提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认为这种关系和两国的货物贸易一样,都是通过比较贸易实现的,夫妻双方都应进行最优的专业化分工,使一方完全专注于市场或家庭生产,另一方则完全生产另一种产品,从而通过比较优势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因此夫妻相对资源的多寡决定着双方在家务分配中的议价能力,资源较高的一方可以凭借高议价能力回避家务。Hersch & Stratton (1994) 研究发现,在美国双职工家庭中丈夫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高,其花在家务劳动时间越少,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就越多。之后许多学者通过议价模型 (Lundberg & Pollak, 1996; 齐良书, 2005)、集体家庭模型 (Apps & Rees, 1997; Blundell et al., 2005) 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与家庭内部分工理论不同,公平理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提出当个体在某种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时,往往会感到焦虑 (Walster et al., 1978)。当夫妻双方在

家务承担上相对平等时，他们会有更高的幸福感（Pina & Bengtson, 1993）。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经济自主意识增强，女性市场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然而女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转变和地位提升并未同步体现在家务劳动分工中，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畅红琴等，2009；董晓媛，2009；赵琦，2009；杨菊华，2014）。因此女性的家务时间越长，其幸福感越低（Glass & Fujimoto, 1994；Boye, 2009），而丈夫适当增加家务劳动时间，会显著提升妻子的幸福感，但对其自身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Bird, 1999；Mencarini & Sironi, 2012；Mikula et al., 2012；Arcas et al., 2013）。

家庭内部分工理论和社会公平理论为解释家务分工对个体幸福感水平以及家庭整体效率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国内外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对家庭成员家务劳动时间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解释。相对资源论提出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外部资源赋予个人一定的决策能力，家务劳动的分配取决于家庭成员带来的资源相对量（Brines, 1994），如丈夫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高，其花在家务劳动时间越少，则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就越多，因此根据这一理论妻子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显得顺理成章。大量研究表明，公平感是家务时间影响妻子幸福感的重要渠道，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这一机制进行验证。

第一，除了承担的实际家务劳动时间配置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夫妻双方在家务分配上的感知同样发挥着作用。现实家务分工上感知到的公平感和实际公平有所不同，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家庭劳动分工是妻子的比较参照对象的函数（Greenstein, 2009）。Fuwa & Tsutsui（2010）研究发现在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国家，女性并不认为这种分工是不公平的，而在家庭劳动分工比较公平的国家，丈夫和妻子家务工作时间的微小差别都会使女性感到不公平。并且女性倾向于将自己分担的家务与其他女性相比，而不是与自己的丈夫对比，因此会造成一种“公平感错觉”（Nakamura & Akiyoshi, 2015），即当妻子认为其他生活在相似环境中的妻子承担更严重更不平衡的家庭分工时，那么她的状况就是相对公平的，这有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

第二，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女性总劳动时间比男性长，其中家务劳动、照料家人等非市场活动是造成女性比男性工作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畅红琴，2010）。而且 MacPhail & Dong（2007）发现，女性并不会像男性那样通过增加市场劳动时间来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也就是说逐渐增多的市场劳动机会与家务劳动和照料活动的矛盾往往会给女性带来家庭和工作的冲突，使她们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的困境中，因此丈夫增加家务劳动时间可以缓解妻子时间贫困，从而提高妻子幸福感。

第三,从情感的角度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关系也越来越由强调“功能”转向强调“陪伴”(Hicks & Platt, 1970; Hochschild, 2012)。家务上的付出有助于夫妻体会到共建家庭的喜悦与感动,是维持夫妻关系、增进夫妻情感的有效途径(杨菊华, 2014)。Pina & Bengtson (1993) 研究认为,感知到的从丈夫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的程度比实际的家务分工更能影响妻子的幸福感,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务,表达对妻子的爱,能使夫妻关系更融洽(Erickson, 1993; Sigle-Rushton, 2010; Parker & Wang, 2013)。Flood & Genadek (2016) 用美国时间利用数据研究表明,夫妻共处时间对个体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当个体和他们的配偶在一起时,报告显示夫妻之间会更快乐,更有意义,压力更小(Sullivan, 1996)。杜凤莲等(2018)使用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夫妻共处时间对夫妻幸福感影响不显著,提出中国式夫妻关系经济功能更甚精神陪伴。

### 三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研究家务分工对幸福感的影响。CTUS样本涵盖29个省份(见附表1),在全国和省级层面均具有代表性。通过入户访谈填写日志的方法,收集了来自于12484户家庭、年龄在3岁及以上30715个家庭成员的时间利用情况;2017年CTUS调查记录了被访问者在调查当日从前一日凌晨4:00至当日凌晨4:00,每隔10分钟的时间利用情况。2017年CTUS的调查日志中包含谁(who)、什么活动(what)、何地(when)、与何人(with whom)、时长(time)以及时点(timing)等六个要素,不仅包括主要活动信息,还收集了次要活动的翔实信息。CTUS中将日常活动划分为有酬劳动、无酬劳动、教育培训、休闲社交和个人照料5个大类,共包括300种小类活动。此外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同时进行<sup>①</sup>,因此2017年CTUS除了被访者的时间利用信息之外,还包括极为丰富的个人、家庭、社区信息。本文研究样本限定在夫妻健在的家庭,扣除缺乏重要信息的样本后,共6104户家庭,12208个个体样本。

本文研究家务分工对夫妻双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参照已有关于幸福感研究的做法,因变量主观幸福感采用居民生活满意度作为度量指标。CTUS询问了受访者

<sup>①</sup> 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介绍可参见<https://chfs.swufe.edu.cn/>。

“您对您的生活满意吗”，用 1 到 5 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数值越大表示幸福感越高，呈现出典型的序数数据特征。核心自变量为家务时间，具体包括丈夫/妻子家务时间，计算方法是加总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问卷中做家务、照料家人和对外提供帮助大项活动下的购物、修理电器等小项活动的时间；丈夫/妻子家务时间占比，指丈夫/妻子一天内家务时间与夫妻双方总家务时间的比值。其他控制变量例如夫妻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周岁）、年龄平方、性别、受教育年限（年）、健康状况、职业。其中性别是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0；健康状况是虚拟变量，自评健康不好 = 0，好 = 1；职业是虚拟变量，属于事业单位、国有、集体单位 = 1，否 = 0。家庭相关特征包括：户籍、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和户主性别（男性 = 1，女性 = 0）。社区变量是指家庭收入相对社区收入水平，为虚拟变量，高于社区平均水平 = 1，低于社区平均水平 = 0。地区变量指省级虚拟变量，包括 29 个省份。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 1 描述了丈夫、妻子幸福感随配偶家务时间和家务时间占比的变化情况，其中把夫妻家务时间占比三等分，分别为低、中、高，发现在报告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这两组中，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的幸福感水平都随配偶家务时间占比的增加先减少再增加，即分别在配偶承担中等家务比例时的不幸福占比最低；在报告一般幸福的组别中，丈夫和妻子幸福感占比也呈先降后升，但总体变化不明显；在报告幸福和非常幸福的两组中，丈夫和妻子的幸福感占比都先上升后下降，即配偶承担过低或过高家务时，报告幸福和非常幸福占比较低，当配偶承担中等家务水平时，夫妻幸福感程度最高。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报告的幸福感中，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占比较大，两者加起来均达到 75% 以上，而不满意（包括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占比较少，分别为 4.29% 和 3.82%。丈夫日均家务时间约为 1.1273 小时，妻子约为 3.0329 小时，约为丈夫的 2.6904 倍；丈夫承担家务时间的比例约为 25%，妻子约为 75%，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一致。丈夫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6894 年，略高于妻子的 8.3270 年；夫妻的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14.12% 的丈夫其职业属于事业单位、国有或集体单位，高于妻子的 8.49%；样本中有 71.02% 的城镇家庭，28.98% 的农村家庭；每个家庭人口规模约为 2.6991 个人；家庭人均收入对数为 9.6453，家庭相对收入高于社区平均收入的占 6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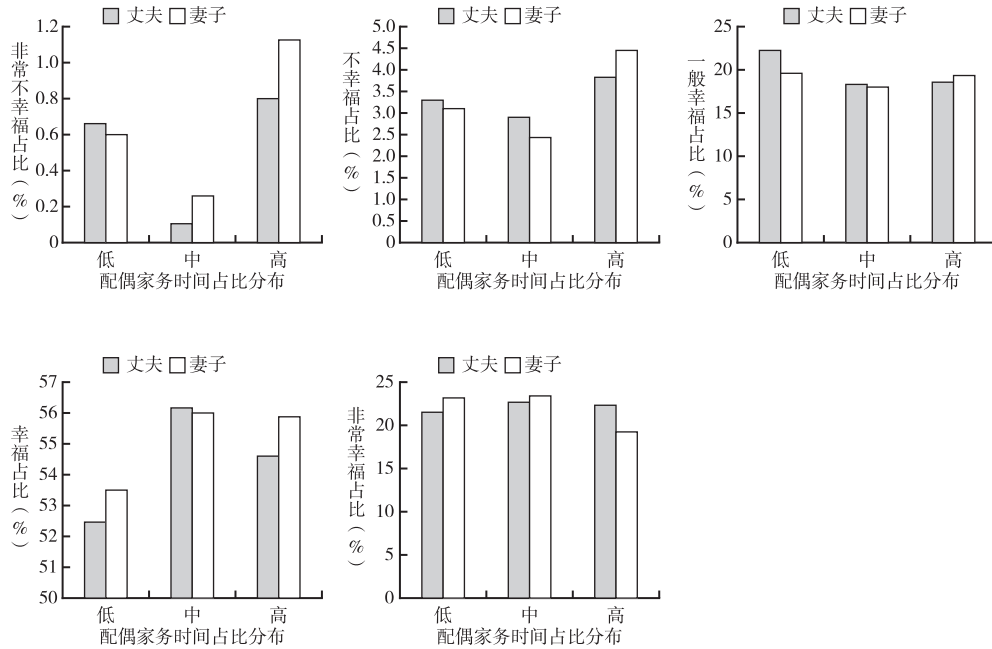


图1 丈夫、妻子幸福感随配偶家务时间占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计算得到。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维度	变量名称	总体	丈夫	妻子
幸福感水平	非常不幸福	0.6471	0.6717	0.6225
	不幸福	3.4076	3.6206	3.1946
	一般幸福	19.0613	18.9220	19.2005
	幸福	54.4479	54.5544	54.3414
	非常幸福	22.4361	22.2313	22.6409
家务时间	家务时间(小时)	2.1321 (2.4267)	1.1273 (1.8459)	3.0329 (2.3733)
	家务时间占比	0.5000 (0.4074)	0.2485 (0.3205)	0.7515 (0.3205)
个人特征	年龄(岁)	54.5890 (13.9714)	55.7153 (14.0701)	53.4627 (13.7814)
	受教育年限(年)	9.0082 (4.1603)	9.6894 (3.7499)	8.3270 (4.4305)

续表

维度	变量名称	总体	丈夫	妻子
个人特征	健康状况	0.4602 (0.4984)	0.4838 (0.4998)	0.4366 (0.4960)
	职业	0.1130 (0.3167)	0.1412 (0.3483)	0.0849 (0.2787)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9.6453 (1.3743)	— —	— —
	户籍	0.7102 (0.4537)	— —	— —
	家庭人口规模(人)	2.6991 (1.0071)	— —	— —
	户主性别	0.5878 (0.3167)	— —	— —
社区特征	家庭收入相对 社区收入水平	0.6067 (0.4885)	— —	— —

注：括号内为变量的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计算得到。

#### 四 实证分析

在计量上常用有序 Logit 模型和有序 Probit 模型，这两种模型都是受限因变量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它们都是用可观测的有序反映数据来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变化规律的模型，使用潜变量来推导出 MLE 估计量。这两个模型的差异在于对误差项分布情况的假设，其中有序 Logit 模型对于误差项假定其服从 Logistic 分布，而有序 Probit 模型假定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本文的因变量幸福感是有序离散变量，且样本数量足够多（此时的 Logistic 分布接近正态分布），所以我们采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有序概率（Ordered Probit，简称 OProbit）模型进行估计（Ferreri-Carbonell, 2005；Lohmann, 2015）。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Happiness_{ij} = \alpha + \beta_1 H\_time_j + \beta_2 R\_H\_time_j + \beta_3 R\_H\_time_j^2 + \beta_4 X_{ij} + \delta_j + \varepsilon_{ij}, i = m, f$$

其中，下标  $i$  表示夫妻双方， $m$  为丈夫， $f$  为妻子，下标  $j$  表示第  $j$  个省份， $H\_time_j$  和  $R\_H\_time_j$  分别为配偶的家务时间和家务时间占比； $Happiness_{ij}$  为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



感； $X_{ij}$ 代表一些已经被证实能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变量，主要包括年龄及其平方项、受教育年限、自评健康状况、户籍、家庭人均收入等； $\delta_j$ 表示省份虚拟变量，检验时使用省份层面聚类标准误； $\varepsilon_{ij}$ 为随机扰动项。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家务时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配偶的家务时间对其幸福感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具体来说，家务时间每增加 1 小时，配偶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上升 0.03 个百分点，不幸福的概率上升 0.10 个百分点，一般幸福的概率上升 0.32 个百分点，幸福的概率下降 0.01 个百分点，非常幸福的概率下降 0.44 个百分点；家务时间占比对其配偶的幸福感水平影响不显著。并且发现家务时间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对女性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妻子对家务劳动的敏感程度更高 (Foster & Stratton, 2019)。因此接下来表 3 分别对妻子和丈夫的幸福感水平进行检验。

就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而言，下文以居民报告非常幸福一列为例进行解释说明。其中性别显著为负，男性（丈夫）的幸福感水平要低于女性（妻子），当性别为男性时，非常幸福的概率下降 1.26 个百分点；年龄系数一次项为负，每增加 1 岁，报告非常幸福的概率下降 0.65 个百分点；年龄二次项系数为正，所以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正抛物线形状；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居民幸福感，但不显著；个人健康状况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个体健康状况越好，其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具体来说，健康会使居民非常幸福的概率提高 8.04 个百分点；处于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会提高幸福感水平（使非常幸福的概率提高 2.55 个百分点）；城市居民的幸福明显低于农村；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也有正向促进作用，当家庭收入高于社区平均水平时，报告非常幸福的概率会提高 1.71 个百分点。这些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陈钊等，2012；刘军强等，2012；陆方文等，2017）。

表 2 家务时间对幸福感影响的 OProbit 估计结果

变量	(1) <i>Happiness</i>	(2) <i>Happiness = 1</i>	(3) <i>Happiness = 2</i>	(4) <i>Happiness = 3</i>	(5) <i>Happiness = 4</i>	(6) <i>Happiness = 5</i>
配偶家务时间	-0.0155 *** (0.0056)	0.0003 *** (0.0001)	0.0010 *** (0.0004)	0.0032 *** (0.0012)	-0.0001 (0.0001)	-0.0044 *** (0.0016)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0.0046 (0.1057)	-0.0001 (0.0018)	-0.0003 (0.0067)	-0.0010 (0.0220)	0.0000 (0.0004)	0.0013 (0.0301)

续表

变量	(1) <i>Happiness</i>	(2) <i>Happiness = 1</i>	(3) <i>Happiness = 2</i>	(4) <i>Happiness = 3</i>	(5) <i>Happiness = 4</i>	(6) <i>Happiness = 5</i>
配偶家务时间 占比平方	-0.0241 (0.1036)	0.0004 (0.0017)	0.0015 (0.0066)	0.0050 (0.0216)	-0.0001 (0.0004)	-0.0069 (0.0295)
性别	-0.0443 * (0.0261)	0.0007 * (0.0004)	0.0028 * (0.0017)	0.0092 * (0.0054)	-0.0002 (0.0002)	-0.0126 * (0.0074)
家庭人均 收入对数	0.0458 *** (0.0105)	-0.0008 *** (0.0002)	-0.0029 *** (0.0007)	-0.0095 *** (0.0022)	0.0002 (0.0002)	0.0130 *** (0.0030)
户籍	-0.1288 *** (0.0265)	0.0021 *** (0.0005)	0.0082 *** (0.0017)	0.0268 *** (0.0055)	-0.0005 (0.0005)	-0.0367 *** (0.0075)
户主性别	-0.0254 (0.0209)	0.0004 (0.0003)	0.0016 (0.0013)	0.0053 (0.0043)	-0.0001 (0.0001)	-0.0072 (0.0059)
家庭人口规模	0.0023 (0.0177)	-0.0000 (0.0003)	-0.0001 (0.0011)	-0.0005 (0.0037)	0.0000 (0.0001)	0.0007 (0.0051)
年龄	-0.0288 *** (0.0052)	0.0004 *** (0.0001)	0.0014 *** (0.0003)	0.0047 *** (0.0011)	-0.0001 (0.0001)	-0.0065 *** (0.0015)
年龄平方	0.0004 *** (0.000)	-0.0000 *** (0.0000)	-0.0000 *** (0.0000)	-0.0001 ***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 (0.0000)
受教育年限	0.0019 (0.0032)	-0.0000 (0.0001)	-0.0001 (0.0002)	-0.0004 (0.0007)	0.0000 (0.0000)	0.0005 (0.0009)
健康状况	0.2797 *** (0.0243)	-0.0044 *** (0.0006)	-0.0173 *** (0.0016)	-0.0586 *** (0.0051)	-0.0002 (0.0012)	0.0804 *** (0.0070)
配偶健康状况	0.1617 *** (0.0243)	-0.0026 *** (0.0005)	-0.0101 *** (0.0016)	-0.0338 *** (0.0051)	0.0002 (0.0007)	0.0463 *** (0.0070)
职业	0.0896 *** (0.0339)	-0.0015 ** (0.0006)	-0.0057 *** (0.0022)	-0.0187 *** (0.0071)	0.0003 (0.0004)	0.0255 *** (0.0097)
配偶职业	0.0344 (0.0335)	-0.0006 (0.0006)	-0.0022 (0.0021)	-0.0072 (0.0070)	0.0001 (0.0002)	0.0098 (0.0095)
家庭收入相对 社区收入水平	0.0601 ** (0.0248)	-0.0010 ** (0.0004)	-0.0038 ** (0.0016)	-0.0125 ** (0.0052)	0.0002 (0.0003)	0.0171 ** (0.0071)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208	12208	12208	12208	12208	12208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计算得到。

表3分别报告了丈夫、妻子家务时间对配偶幸福感水平的 OProbit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丈夫家务时间会降低妻子幸福感。具体来说,丈夫家务时间每增加1小时,妻子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上升0.06个百分点,不幸福的概率上升0.22个百分点,一般幸福的概率上升0.76个百分点,对妻子感到幸福的概率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感到非常幸福的概率下降1.03个百分点;丈夫家务时间占比的系数为正,且二次项系数为负,呈倒U型,说明适当提高丈夫家务时间占比会提高妻子幸福感水平。具体来说,丈夫家务时间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妻子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68个百分点,不幸福的概率下降2.53个百分点,一般幸福的概率下降8.89个百分点,对幸福的概率影响不显著,非常幸福的概率提高12.03个百分点,并且最优点分别出现在41.46%、41.07%、41.12%、38.89% (不显著)、41.14%,表明适度提高丈夫家务时间占比,调节家庭内部时间配置,在公平感知的作用下,会提高妻子幸福感水平。但在有限时间的约束下,用于市场劳动与家庭生产的时间是此消彼长的,过长的家务时间会给丈夫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惩罚,降低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另外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的分配是根植于性别意识中 (Greenstein, 1996),即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传统上均被视作妻子责任,因此当丈夫承担家务劳动超过一定比例时会造成妻子性别角色缺失,降低其幸福感水平。而妻子家务时间及其占比对丈夫幸福感影响水平不显著。

## (二) 内生性讨论

在检验家务分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虽然本文将可能造成估计偏误的因素(如收入、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省份固定效应等)纳入方程中进行了控制,可以有效缓解由于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是,还可能存在幸福感越高的居民,其夫妻关系越和睦,丈夫更倾向于帮妻子分担家务劳动,进而导致反向因果的估计偏误。

解决内生性问题通常用工具变量估计法,但由于文中居民主观幸福感是1~5的离散变量,基于连续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可能会失效 (Sajaia, 2008)。因此,用Roodman (2011)提出的条件混合过程方法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简称CMP)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目前这种方法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与较为广泛的应用 (Russo, 2012; 祝仲坤、冷晨昕, 2018)。

本文采用2014年各省女性发展指数作为各个家庭夫妻家务占比的工具变量<sup>①</sup>。

<sup>①</sup> 女性发展指数来自《2013-201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

表 3 家务时间对配偶幸福感影响的 OProbit 估计结果

变量	丈夫对妻子					妻子对丈夫						
	(1) Happiness	(2) Happiness = 1	(3) Happiness = 2	(4) Happiness = 3	(5) Happiness = 4	(6) Happiness = 5	(7) Happiness	(8) Happiness = 1	(9) Happiness = 2	(10) Happiness = 3	(11) Happiness = 4	(12) Happiness = 5
配偶家务时间	-0.0364 <sup>***</sup> (0.0108)	0.0006 <sup>***</sup> (0.0002)	0.0022 <sup>***</sup> (0.0007)	0.0076 <sup>***</sup> (0.0023)	-0.0001 (0.0002)	-0.0103 <sup>***</sup> (0.0031)	-0.0098 (0.0066)	0.0002 (0.0001)	0.0007 (0.0004)	0.0020 (0.0014)	-0.0001 (0.0001)	-0.0028 (0.0019)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0.4234 <sup>**</sup> (0.1668)	-0.0068 <sup>**</sup> (0.0029)	-0.0253 <sup>**</sup> (0.0101)	-0.0889 <sup>**</sup> (0.0350)	0.0007 (0.0025)	0.1203 <sup>**</sup> (0.0474)	0.1493 (0.1968)	-0.0025 (0.0033)	-0.0100 (0.0132)	-0.0306 (0.0404)	0.0008 (0.0014)	0.0423 (0.0558)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平方	-0.5148 <sup>***</sup> (0.1669)	0.0082 <sup>***</sup> (0.0030)	0.0308 <sup>***</sup> (0.0102)	0.1081 <sup>***</sup> (0.0350)	-0.0009 (0.0030)	-0.1462 <sup>***</sup> (0.0474)	-0.0323 (0.1630)	0.0005 (0.0028)	0.0022 (0.0109)	0.0066 (0.0334)	-0.0002 (0.0009)	-0.0091 (0.0462)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555 <sup>***</sup> (0.0156)	-0.0009 <sup>***</sup> (0.0003)	-0.0033 <sup>***</sup> (0.0010)	-0.0116 <sup>***</sup> (0.0033)	0.0001 (0.0003)	0.0158 <sup>***</sup> (0.0044)	0.0392 <sup>***</sup> (0.0141)	-0.0007 <sup>**</sup> (0.0003)	-0.0026 <sup>***</sup> (0.0010)	-0.0080 <sup>***</sup> (0.0029)	0.0002 (0.0002)	0.0111 <sup>***</sup> (0.0040)
户籍	-0.0732 <sup>*</sup> (0.0379)	0.0012 <sup>**</sup> (0.0006)	0.0044 <sup>*</sup> (0.0023)	0.0154 <sup>*</sup> (0.0080)	-0.0001 (0.0004)	-0.0208 <sup>*</sup> (0.0108)	-0.1704 <sup>***</sup> (0.0370)	0.0029 <sup>***</sup> (0.0007)	0.0114 <sup>***</sup> (0.0026)	0.0350 <sup>***</sup> (0.0076)	-0.0009 (0.0010)	-0.0483 <sup>***</sup> (0.0105)
户主性别	-0.0655 <sup>**</sup> (0.0297)	0.0010 <sup>**</sup> (0.0005)	0.0039 <sup>**</sup> (0.0018)	0.0138 <sup>**</sup> (0.0062)	-0.0001 (0.0004)	-0.0186 <sup>**</sup> (0.0084)	0.0303 (0.0297)	-0.0005 (0.0005)	-0.0020 (0.0020)	-0.0062 (0.0061)	0.0002 (0.0002)	0.0086 (0.0084)
家庭人口规模	0.0321 <sup>*</sup> (0.0180)	-0.0005 <sup>*</sup> (0.0003)	-0.0019 <sup>*</sup> (0.0011)	-0.0067 <sup>*</sup> (0.0038)	0.0001 (0.0002)	0.0091 <sup>*</sup> (0.0051)	0.0106 (0.0177)	-0.0002 (0.0003)	-0.0007 (0.0012)	-0.0022 (0.0036)	0.0001 (0.0001)	0.0030 (0.0050)
年龄	-0.0244 <sup>***</sup> (0.0081)	0.0004 <sup>***</sup> (0.0001)	0.0015 <sup>***</sup> (0.0005)	0.0051 <sup>***</sup> (0.0017)	-0.0000 (0.0001)	-0.0069 <sup>***</sup> (0.0023)	-0.0201 <sup>***</sup> (0.0076)	0.0003 <sup>***</sup> (0.0001)	0.0013 <sup>***</sup> (0.0005)	0.0041 <sup>***</sup> (0.0016)	-0.0001 (0.0001)	-0.0057 <sup>***</sup> (0.0021)
年龄平方	0.0004 <sup>***</sup> (0.0001)	-0.0000 <sup>***</sup> (0.0000)	-0.0000 <sup>***</sup> (0.0000)	-0.0001 <sup>***</sup>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sup>***</sup> (0.0000)	0.0003 <sup>***</sup> (0.0001)	-0.0000 <sup>***</sup> (0.0000)	-0.0000 <sup>***</sup> (0.0000)	-0.0001 <sup>***</sup>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sup>***</sup> (0.0000)

续表

变量	丈夫对妻子					妻子对丈夫						
	(1) Happiness	(2) Happiness = 1	(3) Happiness = 2	(4) Happiness = 3	(5) Happiness = 4	(6) Happiness = 5	(7) Happiness	(8) Happiness = 1	(9) Happiness = 2	(10) Happiness = 3	(11) Happiness = 4	(12) Happiness = 5
受教育年限	0.0007 (0.0044)	-0.0000 (0.0001)	-0.0000 (0.0003)	-0.0002 (0.0009)	0.0000 (0.0000)	0.0002 (0.0013)	0.0022 (0.0048)	-0.0000 (0.0001)	-0.0001 (0.0003)	-0.0004 (0.0010)	0.0000 (0.0000)	0.0006 (0.0014)
健康状况	0.2695*** (0.0348)	-0.0040*** (0.0008)	-0.0156*** (0.0022)	-0.0568*** (0.0074)	-0.0013 (0.0016)	0.0777*** (0.0101)	0.2873*** (0.0341)	-0.0046*** (0.0009)	-0.0189*** (0.0024)	-0.0595*** (0.0072)	0.0011 (0.0017)	0.0819*** (0.0097)
配偶健康状况	0.1922*** (0.0343)	-0.0029*** (0.0007)	-0.0113*** (0.0021)	-0.0407*** (0.0074)	0.0001 (0.0011)	0.0548*** (0.0098)	0.1312*** (0.0349)	-0.0021*** (0.0006)	-0.0086*** (0.0023)	-0.0270*** (0.0072)	0.0003 (0.0008)	0.0374*** (0.0100)
职业	0.0727 (0.0523)	-0.0012 (0.0009)	-0.0043 (0.0031)	-0.0153 (0.0110)	0.0001 (0.0004)	0.0206 (0.0148)	0.1117** (0.0454)	-0.0019*** (0.0008)	-0.0075** (0.0031)	-0.0229** (0.0093)	0.0006 (0.0007)	0.0317** (0.0129)
配偶职业	0.0507 (0.0441)	-0.0008 (0.0007)	-0.0030 (0.0026)	-0.0106 (0.0093)	0.0001 (0.0003)	0.0144 (0.0125)	0.0062 (0.0525)	-0.0001 (0.0009)	-0.0004 (0.0035)	-0.0013 (0.0108)	0.0000 (0.0003)	0.0018 (0.0149)
家庭收入相对社区收入水平	0.0607* (0.0353)	-0.0010* (0.0006)	-0.0036* (0.0021)	-0.0127* (0.0074)	0.0001 (0.0004)	0.0172* (0.0100)	0.0586* (0.0349)	-0.0010* (0.0006)	-0.0039* (0.0023)	-0.0120* (0.0072)	0.0003 (0.0004)	0.0166* (0.0099)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具体估计两个方程：第一个方程为家务时间占比决定因素方程，第二个方程为幸福感决定因素方程。一方面，女性发展指数主要涉及生命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参与这四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领域。女性发展指数越高，代表其参与市场劳动的机会越大，而每个家庭家务劳动量基本是既定的，因此男性所承担的比例就越高。另一方面，各省女性发展指数还可能通过家务分工之外的途径影响幸福感而并非完全外生。比如指数高的省份可能是经济发展较好，因此在模型中控制该省份 GDP、个人收入、健康等变量以消除各省女性发展指数作为工具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使用各省女性发展指数作为家庭中丈夫家务劳动承担比例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CMP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女性发展指数对丈夫承担家务比例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条件。进一步来看，CMP 方法估计结果中，妻子家务时间占比决定方程的内生性检验参数  $\text{atanrho}_{12}$  在 1% 水平下显著，同样说明丈夫家务时间占比为内生解释变量。接下来，CMP 方法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纠正可能的内生性偏误后丈夫相对家务时间对妻子主观幸福感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并存在倒 U 型关系。且这种方法最终所得的估计系数比前文结果要大，这进一步印证了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主观幸福感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妻子家务时间占比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与前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这表明前文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健性。

表 4 家务时间对夫妻幸福感影响的 CMP 估计结果

变量	幸福感			
	妻子		丈夫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配偶家务时间		-0.0304 *** (0.0101)		-0.0112 * (0.0066)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1.8239 *** (0.4277)		0.1154 (0.3434)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平方		-0.3761 ** (0.1555)		-0.0265 (0.1643)
女性发展指数	0.0354 ** (0.0166)		-0.0329 ** (0.0166)	

续表

变量	幸福感			
	妻子		丈夫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内生性检验参数	-0.4868 *** (0.1647)		0.0050 (0.088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104	6104	6104	6104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内生性检验参数为 atanhrho\_12 统计量。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计算得到。

## 五 传导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平等的家务分工有助于妻子幸福感的提高，而对丈夫影响不显著。关于家务时间对夫妻幸福感影响的传导渠道，根据理论分析和数据可用性，本文主要从相对资源理论、相对剥夺理论、时间贫困以及夫妻共处时间这四个角度去验证。

结构性资源的主要测度指标有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特征等。接下来本文引入夫妻教育差距（丈夫受教育年限减去妻子受教育年限的差值）和丈夫家务时间占比与夫妻教育差距的交乘项。结果如表 5 第（1）列和第（2）列所示，其中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幸福感水平有正向影响，教育差距会降低幸福感，交乘项显著为负，表明当丈夫受教育年限高于妻子时，提高丈夫家务时间占比会降低其幸福感水平。原因在于，根据相对资源理论的推断，在不考虑其他资源差异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高的一方会利用教育优势规避家务，因此受教育低的一方就会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另外夫妻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更大，而且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倾向于持传统的性别观念，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因此，夫妻受教育程度相同或者妻高夫低的家庭中妻子对家务分工是否公平更敏感。

平等的家务分工会提高妻子幸福感水平，但在现实家务分工上感知到的公平感和实际公平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女性倾向于将自己分担的家务和工资水平与其他女性

表 5 家务时间对夫妻幸福感水平影响的 OProbit 估计结果

变量	相对资源理论		相对剥夺理论				时间贫困				共处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配偶家务时间	-0.0355*** (0.0108)	-0.0096 (0.0066)	-0.0375*** (0.0110)	-0.0129* (0.0068)	-0.0316*** (0.0099)	-0.0097 (0.0066)	-0.0319*** (0.0115)	-0.0096 (0.0067)	-0.0319*** (0.0115)	-0.0096 (0.0067)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0.6014*** (0.1931)	0.1065 (0.2160)	-0.0337 (0.2290)	0.1628 (0.2025)	-0.4440** (0.1928)	0.3801** (0.1616)	-0.7313*** (0.0586)	0.1569 (0.1970)	0.3983** (0.1762)	0.0675 (0.2020)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平方	-0.5177*** (0.1668)	-0.0246 (0.1630)	-0.1937 (0.2051)	-0.0525 (0.1657)		-0.4951*** (0.1645)		-0.0451 (0.1636)	-0.4906*** (0.1741)	0.0461 (0.1715)		
受教育差异	-0.0122 (0.0530)	-0.1182 (0.0946)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x 受教育差异	-0.2127* (0.1165)	0.0449 (0.1181)										
不平等			-0.1763*** (0.0505)	-0.2868 (0.2362)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x 不平等			0.2896* (0.1712)	0.2884 (0.3099)								
时间贫困												
一起照料												
未成年人												
一起照料 成年人												
一起从事传统家务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6104		

注：第 (5) 列和第 (7) 列的因变量为“妻子/丈夫是否时间贫困”，其余列因变量分别为妻子/丈夫幸福水平；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 (CTUS) 数据计算得到。



相比,而不是与自己的丈夫比较。因此本文引入不平等变量(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夫妻家务时间占比高于社区平均水平=1,否则=0)和该变量与丈夫/妻子家务时间占比的交乘项,结果如表5第(3)列和第(4)列所示。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幸福感影响不再显著,而当妻子家务时间占比高于社区平均水平时,其幸福感会降低,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当妻子家务时间占比高于社区平均水平时,即妻子相对于周围人处于不公平状态时,此时提高丈夫家务时间会提高妻子幸福感水平。与基准回归一致,妻子家务时间占比对丈夫影响不显著,说明当妻子与周围其他妻子相比,发现其面临的家务分工状况更好时,丈夫增加家务劳动时间会降低其幸福感水平,而当其状况较差时,其会认为自己正面临着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所以提高丈夫家务时间比例会改善其幸福感。

Vickery (1977) 把时间贫困定义为工作时间(包括市场劳动和非市场劳动)超过某一特定时间的状况。在本文中把一天内总劳动时间(有酬劳动时间加上无酬劳动时间)超过10.20小时的居民定义为存在时间贫困。表5报告了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时间贫困的影响,表5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提高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可以缓解妻子时间贫困,从而提高妻子幸福感水平,第(6)列的结果对此结论进行了检验。当控制了时间贫困时,丈夫家务时间占比的系数降低。因此可以认为提高丈夫家务时间比例,可以缓解妻子时间贫困,从而提高其幸福感,同时发现提高妻子家务时间占比对丈夫幸福感影响依旧不显著。原因在于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女性总劳动时间比男性长,其中家务劳动、照料家人等非市场活动是造成女性比男性时间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畅红琴,2010)。MacPhail & Dong (2007)发现,女性并不会像男性那样通过增加市场劳动时间显著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也就是说逐渐增多的市场劳动机会与家务劳动和照料活动的矛盾往往会给女性带来家庭——工作冲突,使她们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的困境中,因此增加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可以提高其幸福感水平。

已有研究表明,丈夫主动帮妻子承担家务劳动是一种对妻子的情感支持。家务分工越平等,夫妻双方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意味着夫妻间彼此交流的时间越长。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在调查每一个活动时都会附加一个选项:“参与此项活动时和谁在一起”,并且每一个活动都会有准确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这两个关键信息为本文提供夫妻在一起时间。表5第(9)列和第(10)列展示了在控制夫妻各类共处时间变量后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夫妻一起照顾成年人会降低夫妻双方幸福感,其他两个夫妻共处时间变量对妻子和丈夫幸福感水平影响都不显著,丈夫相对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幸福感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与配偶共处时间对夫妻幸福感无显著影响,与杜凤莲等(2018)的研究一致。

## 六 结论

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 (CTUS) 数据研究家务时间对夫妻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社区特征之后,妻子家务时间对丈夫幸福感水平影响不显著,丈夫家务时间对妻子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丈夫家务时间会降低妻子幸福感,但家务时间占比对妻子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呈现出倒 U 型关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理念可能是夫妻间这一不对称幸福感知的主要原因。

本文同时验证了家庭内部分工学说和公平理论,发现具有教育资源优势,从而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相对优势的一方承担了较少的家务时间。妻子对公平的感知是其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对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一方会利用教育优势从而规避家务劳动。在相对公平理论影响渠道验证中,本文证实了“公平感知错觉”(即如果一个妻子认为其他生活在相似环境中的妻子承担着严重不平衡的家庭分工,那么她就认为自己的不平衡分工是相对公平的)和时间贫困的存在,但拒绝了陪伴理论。提高丈夫家务时间占比,可以缓解妻子时间贫困,进而提高其幸福感水平;家务分工的实际公平和妻子感知的公平感存在差异,若妻子认为相对其他生活在相似环境中的妻子承担更严重不平衡的家庭分工,其丈夫承担越多家务,幸福感水平越高。

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家庭幸福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本文政策含义如下:第一,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第二,教育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第三,适当提高丈夫家务劳动承担比例,既提升妻子在家务劳动上的公平感,又有助于缓解女性时间贫困。

附录:

附表 1 样本省份分布情况

省份	占比 (%)	省份	占比 (%)	省份	占比 (%)	省份	占比 (%)
北京市	3.69	福建省	4.26	江西省	2.54	宁夏回族自治区	1.62
天津市	3.57	广东省	4.91	河南省	2.70	四川省	3.92

续表

省份	占比(%)	省份	占比(%)	省份	占比(%)	省份	占比(%)
河北省	4.70	海南省	2.28	湖北省	2.85	重庆市	3.39
辽宁省	3.72	山西省	4.42	湖南省	4.05	云南省	2.34
山东省	4.64	吉林省	3.34	陕西省	2.10	贵州省	1.61
江苏省	4.42	黑龙江省	3.18	甘肃省	1.98	内蒙古自治区	4.55
上海市	6.95	安徽省	2.79	青海省	1.61	广西壮族自治区	2.79
浙江省	5.10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计算得到。

### 参考文献：

- 畅红琴（2010），《中国农村地区时间贫困的性别差异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第9-14页。
- 畅红琴、董晓媛、Fiona MacPhail（2009），《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第77-89页。
- 陈钊、徐彤、刘晓峰（2012），《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世界经济》第4期，第79-101页。
- 董晓媛（2009），《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人口与发展》第6期，第61-68页。
- 杜凤莲、王文斌、董晓媛（2018），《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82-102页。
- 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2017），《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经济研究》第10期，第173-188页。
- 齐良书（2005），《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9期，第78-90页。
- 徐安琪、刘汶蓉（2003），《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上海市的经验研究》，《中国人口

- 科学》第3期，第41-47页。
- 杨菊华（2014），《传续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学术研究》第2期，第31-41页。
- 赵琦（2009），《家务劳动对城镇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人口与经济》第S1期，第13-14页。
- 祝仲坤、冷晨昕（2018），《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来自CSS2013的经验证据》，《经济评论》第1期，第78-90页。
- Aguiar, Mark & Erik Hurst (2007). 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 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3), 969-1006.
- Apps, Patricia & Ray Rees (1997). Collective Labor Supply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1), 178-190.
- Arcas, Marta, Ana Novoa & Lucía Artazcoz (2013). Gender Inequaliti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mands of Family and Domestic Life and Health in Spanish Worker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3 (5), 883-888.
- Barnett, Rosalind & Yu-Chu Shen (1997). Gender, High- and Low-Schedule-Control Housework Task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Study of Dual-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8 (4), 403-428.
- Becker, Gary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ird, Chloe (1999). Gender, Household Labor,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 Impact of the Amount and Division of Housework.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0 (1), 32-45.
- Blundell, Richard, Pierre-André Chiappori & Costas Meghir (2005). Collective Labor Supply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6), 1277-1306.
- Boye, Katarina (2009). Relatively Different? How Do Gender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Depend on Paid and Unpaid Work in Europ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3 (3), 509-525.
- Brines, Julie (1994).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3), 652-688.
- Bryson, Rebecca, Jeff Bryson & Marilyn Johnson (1978). Family Size, Satisfac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Dual-Career Coupl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 (1), 67-77.
- Carlson, Matthew & Jason Hans (2020). Maximizing Benefits and Minimizing Impacts: Dual-

- Earners' Perceive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6 (2), 208 – 225.
- Cunningham, Mick (2008).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Male Breadwinner, Female Homemaker Family Model: Influences of Women's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over the Lifecourse. *Social Forces*, 87 (1), 299 – 323.
- Erickson, Rebecca (1993). Reconceptualizing Family Work: The Effect of Emotion Work on Perceptions of Marital Qua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 (4), 888 – 900.
- Ferrer-i-Carbonell, Ada (2005).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5 – 6), 997 – 1019.
- Flood, Sarah & Katie Genadek (2016). Time for Each Other: Work and Family Constraints among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 (1), 142 – 164.
- Floro, Maria (1995). Economic Restructuring, Gender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 *World Development*, 23 (11), 1913 – 1929.
- Foster, Gigi & Leslie Stratton (2019). What Women Want (Their Men to Do): Housework and Satisfaction in Australian Households. *Feminist Economics*, 25 (3), 23 – 47.
- Frisco, Michelle & Kristi Williams (2003). Perceived Housework Equity, Marital Happiness, and Divorce in Dual-Earner Household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4 (1), 51 – 73.
- Fuwa, Makiko & Junya Tsutsui (2010).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Perceived Fairness of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Japanese Journal of Family Sociology*, 22 (1), 52 – 63.
- Giovanis, Eleftherios (2015). The Effects of Teleworking on Housework Division and Well-Being of Couples. *SSRN Working Paper*, No. 2711319.
- Glass, Jennifer & Tetsushi Fujimoto (1994). Housework, Paid Work, and Depression among Husbands and Wiv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5 (2), 179 – 191.
- Greenstein, Theodore (1996).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ives' and Husbands' Gender Ideolog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3), 585 – 595.
- Greenstein, Theodore (2009). National Context,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Fairness in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4), 1039 – 1051.
- Hersch, Joni & Leslie Stratton (1994). Housework, Wag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 Time for Employed Spous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2), 120 – 125.
- Hicks, Mary & Marilyn Platt (1970). Marital Happiness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 the Six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2 (4), 553 – 574.
- Hochschild, Arlie (2012).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hmann, Steffen (2015).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the Internet Raise Material Aspiration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7 (3), 740 – 759.
- Lundberg, Shelly & Robert Pollak (1996). Bargaining and Distribution in Marria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4), 139 – 158.
- MacPhail, Fiona & Xiaoyuan Dong (2007). Women’s Market Work and Household Statu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Jiangsu and Shandong in the Late 1990s. *Feminist Economics*, 13 (3 – 4), 93 – 124.
- Mencarini, Letizia & Maria Sironi (2012). Happiness, Housework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Europ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2), 203 – 219.
- Mikula, Gerold, Bernhard Riederer & Otto Bodi (2012). Perceived Justice in the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 (4), 680 – 695.
- Nakamura, Mayumi & Mito Akiyoshi (2015). What Determines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Regarding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Spouses? *PLoS One*, 10 (7), 1 – 17.
- Parker, Kim & Wendy Wang (2013). Modern Parenthood: Roles of Moms and Dads Converge as They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14.
- Pina, Darlene & Vern Bengtson (1993).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Wives’ Happiness: Ideology, Employment, and Perceptions of Suppor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 (4), 901 – 912.
- Roodman, David (2011). Fitting Fully Observed Recursive Mixed-Process Models with CMP. *The Stata Journal*, 11 (2), 159 – 206.
- Russo, Giovanni (2012).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Part-Time and Full-Time Workers: The “Identity” Approach.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70 (3), 315 – 343.
- Sajaia, Zurab (2008).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a Bivariate Ordered Probit Model: Implementation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The Stata Journal*, 4 (2), 1 – 18.
- Sigle-Rushton, Wendy (2010). Men’s Unpaid Work and Divorce: Reassessing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in British Families. *Feminist Economics*, 16 (2), 1 – 26.

- Sullivan, Oriel (1996). Time Co-Ordination, the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ur and Affective Relations: Time Use and the Enjoyment of Activities within Couples. *Sociology*, 30 (1), 79 – 100.
- Vickery, Clair (1977). The Time-Poor: A New Look at Povert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2 (1), 27 – 48.
- Walster, Elaine, William Walster & Ellen Berscheid (1978). *Equity: Theory and Resear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Press.

##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Family Happiness

Du Fenglian<sup>1,2</sup>, Su Jingchun<sup>1</sup> & Yang Xinshang<sup>1</sup>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sup>1</sup>;

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Time Us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sup>2</sup>)

**Abstract:** The average time for daily housework in a family is about 4 to 5 hours, and ab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housework is undertaken by women. Currently, researches on how housework division affects family happiness are inadequate. Based on the 2017 Chinese Time Use Survey (CTUS), this paper uses the Ordered Probit and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CMP) method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housework division on couple's perception of happiness. We find that a wife's percentage of housework tim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husband's happiness, while the husband's percentage of housework time can promote wife's happiness, and it has a U-shaped effect on the wife's happiness.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wife's actual perception of fair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She will feel much happier if her husband undertakes more household work than the average amount of the local community. Increasing husband's share of housework can alleviate the wife's time shortage and improve her happiness. The results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to the theory of relative resource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one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a family usually take less housework because of the resources advantages.

**Keywords:** division of housework, happiness, gender equality

**JEL Classification:** I39, J16, J22

(责任编辑: 封永刚)